

【访 谈】

现代性之“恶”与民族主义的“毒”¹

——杜赞奇教授访谈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在中国，共产党一旦获得政权就试图运用新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来实现人的翻身，但甘地却是要在获得权力之前实现个体的转变，以此作为获得政治权力的方法”

杜赞奇的笑容很给力。眉毛胡子都运动起来，拥向那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向外界传达睿智和友善。

“对历史的探索就是一种徘徊在语言和历史真实之间的活动”，这是杜赞奇浸淫史学 40 年的心得。

他与汉学的结缘可追溯到 1973 年。当时他在德里大学念书，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一班历史系学生的浓厚兴趣。“因为它展现了一条可能改变历史的路径，极大地启发了我们，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研究学习的东西。”杜教授告诉记者。

赴美深造分为两个阶段。在芝加哥大学，杜赞奇遇到他最重要的导师之一孔飞力先生。“我在研究中国革命的时候，对中国的农村很感兴趣。我最初的兴趣也受到孔飞力教授的影响，他不是那么激进的人。他认为相对于革命阶层而言，本地政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此《文化、权力与国家》源自我最初的兴趣，并受到美国汉学界非革命一代学者的影响。”

这本书是杜赞奇的博士论文，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 1989 年度杰出东亚历史著作奖；一年后，又获亚洲研究学会约瑟夫·R·列文森 20 世纪中国最佳图书奖——同年，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获得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1977 年，费正清教授自哈佛大学荣退，孔飞力接替费正清出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杜赞奇与导师一同从芝加哥迁往波士顿。

杜赞奇向记者谈起对两座一流学府的比较：“芝大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息（Intellectual）的地方，而哈佛是一个学术性（Scholarly）的地方——我甚至觉得哈佛都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一个权力之地。更确切地说，两所大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纯粹的知识权力，而后者是混杂的知识权力。哈佛总喜欢把总统、国王、大使、前大使这些人物都混杂在校园里，希望兼顾公共职能和公众形象。而对芝大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写过一些什么，有多深入。

寻找发展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人物周刊：您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最后部分用很大篇幅谈论了甘地对现代性的批判。譬如说：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只能刺激人更多的物质欲望，却永不能满足他们；工业化带来破坏、剥削和疾病，造成城市和乡村之间极其严重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在 30 年前，中国一位同样智慧的领袖凭借一句“发展就是硬道理”将中国领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纪元。人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两种看上去矛盾的思想呢？

杜赞奇：我们需要寻找发展和生活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的问题似乎是很难控制，如同普罗米修斯被解开了锁链，一切都被发展所驱动，释放出来追求利润的力量很难被收回，这是最大的挑战。

需要有几个重要人物，如甘地，成为对现代性批评的象征。以芝加哥为例，芝加哥有一个人

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629f90100nzy6.html



文的、反经济发展的传统，一直以出产众多知识分子包括许多诺贝尔奖得主而闻名，但突然间它被视为经济之都，这对芝加哥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于是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院（Milton Friedman Institute）就此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后来弗里德曼就成了芝加哥的象征。我想说的是，芝加哥有很强大的知识传统，我们必须保有这些传统来对现代性进行对抗和平衡。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发展到今天的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什么？

杜赞奇：我认为我们生活在“后西方现代性”的状况中，这个世界正被“发展的观念”所主导，使用着各种现代技术。我们以前认为宗教是和现代性分开的，所以没有意识到文化角色的问题，但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基督教而来的。譬如对个人价值的极度推崇——在新教看来，每个人都像上帝一样，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由此推出个人权利的主张等等。因此我觉得基督教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而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些关于超验的观念，包括中国的天人合一。

现代性带来道德贬值

人物周刊：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冈仓天心、中国的章太炎都在“文明重构”这一主题上提出过自己的主张。您能大致谈谈他们在思想和作为上的异同吗？

杜赞奇：我理解他们是想尝试超越国家，他们是反帝先锋，他们将西方看作推动“文明”概念的帝国主义，而这个文明则是他们试图合法化帝国主义的说辞，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问题是他们除了民族主义以外没有其他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因为民族主义是惟一可用的方法，而一旦如此，你就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划了一条界限。泰戈尔和甘地尝试抵制这种民族主义，但没有用。章太炎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同时是个排满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佛教徒。他不是一个好例子。

我对他们也有批评。他们和大众文化没什么关系，他们对于亚洲的统一性只是局限于高雅文化，譬如士大夫文化，他们不看普通人的生活。那个时候有很多印度人来中国，有一些印度士兵来中国，但这些人是不为这些知识分子所看到的。这些普通人的普通关系是更复杂的。沟通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亚洲仍然是很重要的；而简单地描述伟大的历史文明是不够的。

人物周刊：现代人应该如何面对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和文明、道德的关系？

杜赞奇：我不想讨论短期内的道德上升和堕落，而是想长期来看。作为社会良心的道德是一码事，作为实际操作的道德是另一码事。帝国时期的中国满口仁义道德，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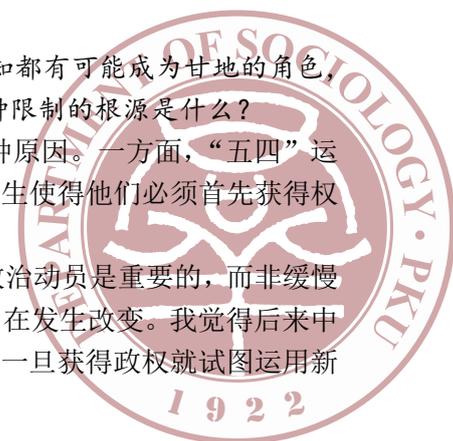
在现代性的长期发展中有一个道德话语的贬值，因为现代性逐渐诋毁道德的价值，将人看作市场社会中的工具。市场社会把人的价值简化为市场价值，而市场书写了人的行为，所以现代社会中道德是没有功用的，甚至父母都不教孩子讲道讲德了。因此我们要提可持续性这个问题，因为它提出了对伦理的要求。这是在我看来惟一的希望。所以今天服务员来房间打扫的时候，我跟她说：不要换毛巾！

毛泽东和甘地都是理想主义者

人物周刊：您曾说过，如果换一种环境，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都有可能成为甘地的角色，但他们最终没能成为。所以，想请教是怎样的环境限制了他们？这种限制的根源是什么？

杜赞奇：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没有成为甘地式的人物有多种原因。一方面，“五四”运动使得现代性成为一个超越一切的需要；另一方面，政治和权力的产生使得他们必须首先获得权力才能实现理想；此外日本的侵华战争也对此有影响。

限制的根源我认为是在这些精英的意识中，为一项事业而做的政治动员是重要的，而非缓慢的对个人的教化，对一个人内在的改变。而甘地是希望每个人都从内在发生改变。我觉得后来中国对个人内在的改变是更成功的，但那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共产党一旦获得政权就试图运用新



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来实现人的翻身，但甘地却是要在获得权力之前实现个体的转变，以此作为获得政治权力的方法——这个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是不被看重的。甘地认为在个人内在发生改变之前获得权力会导致腐败，当然他是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人物周刊：您愿意比较一下毛泽东和甘地的异同么？

杜赞奇：毛和甘地都是很深刻的理想主义者，都相信超验的力量，相信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毛的超验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甘地的超验是他自己来源于一些印度教传统的、对神的理解。当然他们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对甘地来说，你必须自己先成为这个理想本身，让超验在你自身中发生，然后才能承担起真正的权力，而毛则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发动文化大革命。相同的是，他们不止是浪漫主义者，而且都是行动者，要真的实现他们的理想。

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奈保尔在“印度三部曲”中的立场？

杜赞奇：我看过第一本《幽黯国度》。有人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因为他能批评第三世界。如果一个欧洲人批评印度，谁都会指责他，但奈保尔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还能自我批评，西方很高兴。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奈保尔对第三世界具有一种很真诚的批判态度，但他没有责任意识。鲁迅会说这是国民性，也是他自己的状况；但奈保尔不说这样的话，他对印度人没有认同感。如果他能选择，他会选择做欧洲人做英国人，因为他们代表了最高阶段的文明。有不少这样的印度人，他们很勇敢。

有一个可能比奈保尔更伟大的印度作家 Nirad C. Chaudhuri，他也用英文写作，11年前去世。他在孟加拉地区的一个村庄里生活了五十年，做政府秘书。他阅读了所有的欧洲和梵语经典，五十多岁第一次去英国就对英国了如指掌，他一生都在膜拜英国。他的写作中充满了对印度和印度人的强烈批评，但有趣的是，他可以定居在牛津。但他最终选择回到印度，居住在德里旧城。和鲁迅不同的是，他在写作中对印度没有同情；但他又和奈保尔不同，因为他拒绝居住在伦敦——比较这3个人很有意思。

我觉得奈保尔的批评很重要，但是如果他对印度多一些感情，就像鲁迅对中国的感情那样，那么他的批评就会更有效果。这也是为什么鲁迅仍被中国人所热爱的原因。

人物周刊：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中国读书人宁愿饿死也不吃日本大米；印度独立运动时期要求烧毁每一寸来自国外的布匹……今天的民族主义似乎更复杂些。

杜赞奇：过去20年间，民族主义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民族国家和政府已经不那么喜欢过多的民族主义了，因为他们想要全球化。有时候他们想要控制民族主义，这当然很困难。我觉得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强盛是之前过多民族主义教育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是对于过度全球化的一种反应，类似保险丝。

民族主义的功能变了：早期是为了民族独立，现在越来越成为政治经济发展中无用的东西，同时与对全球化的恐惧心理有关。它渐渐成为了一种应激性反应，而失去了建设性功能。

人物周刊：民族主义真的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剂良药吗？

杜赞奇：我从没觉得它是一剂良药。民族主义对于反帝和建国是重要的，但是药三分毒，其力量之大，可以允许人为所欲为——就像“文革”那样，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结合起来，赋予人去摧毁一切的权力。

人物周刊：为什么今天民族主义总是跟“狭隘的”连在一起？

杜赞奇：我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竞争很有关系。当从农业社会演变成



工业社会的时候，你不仅需要不同地区的人融合在一起，而且要有竞争力。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国家是让资本主义社会变得更有竞争力的方式，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参与竞赛，就像大跃进中那样，就需要人们牺牲自己来让国家变得富有竞争力。它的狭隘性就在这里，总是关于自己和他者的。

人物周刊：大约四五年前，学术圈已经注意到国家主义的苗头。您能谈谈对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演变的看法吗？

杜赞奇：民族主义可以是一个进步性的力量，因为它具有各种对民族的视点，譬如本土性和多元文化等。国家主义可能受到限制，但东亚地区的国家主义是政府具有强权。国家主义可以看作政府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则是民间的，后者没有一个政府组织起来的统一看法。在日本，民族主义塑造国家主义；而在中国，民族主义里有执政党的参与。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14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